

肇端于《资本论》：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取径再探

肖永明¹, 吴旺海^{1,2}

(1.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2. 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 德国汉堡, 20354)

摘要: 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声名显赫的侯外庐的研究生涯肇端于《资本论》的翻译。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为侯外庐转向中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资本论》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 使得侯外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形成独到见解, 对中外尤其是苏联学界的“空白说”进行了回应。其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资本论》的理论视角, 呈现出从生产方式出发, 经由社会形态判定, 最终揭示中国思想发展面貌的研究模式。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得以形成系统的研究取径, 《资本论》既是时间起点, 也是逻辑起点。

关键词: 《资本论》; 侯外庐; 中国思想史;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2-0010-09

在中国思想史领域, 侯外庐先生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是思想史学者心摹手追的标杆与典范。李泽厚将侯外庐的研究成果视作中国学者“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解说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以来, “学术界别开生面、颇有水平的开创性著作”^[1]。葛兆光更为直白地指出, “思想史叙事真正完整而且系统地建立起来, 应当是在侯外庐组织《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之后”, 他“超越了哲学史简单的脉络, 重新为中国哲学或思想史建构了全新系谱”^[2]。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少青年选择中国思想史研究作为毕生志业, 也与侯外庐的影响不无关联^①。

值得注意的是, 在思想史领域声名显赫的侯外庐, 其研究生涯却发轫于《资本论》的翻译^②, 通过与马恩原典的接触, 进而涉足社会史领域, 最终落脚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侯外庐自己也说: “数年之后, 当我成为史学界一员时, 以往那段为《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孜孜苦斗的经历, 反而不被人注意了。”^{[3][54]}那么, 侯外庐这段“孜孜苦斗的经历”, 具体的过程与特点究竟如何? 《资本论》又怎样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逐步产生有机联系? 相较于西方的思想史, 这一研究范式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解答, 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侯外庐思想史研究取径的理据、目标与意义, 也为寻求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新提供了模式上的再思。

一、《资本论》翻译研读与侯外庐中国史研究的奠基

侯外庐晚年起草回忆录《初的追求》时, 其中《翻译〈资本论〉的回忆》一篇最早成文^[4]。当时协调文章出版事宜的包遵信阅读初稿后, 请侯外庐增加副标题“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起点”, 侯外庐应

收稿日期: 2024-11-08; 修回日期: 2025-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

作者简介: 肖永明, 男, 湖南武冈人, 历史学博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思想文化史, 联系邮箱: wyythsl@126.com; 吴旺海, 男, 浙江诸暨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与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思想史

允。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举动, 透露出《资本论》这一马恩经典与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紧密关联。追溯其一生的研究经历, 《资本论》的翻译与研读可以被视作侯外庐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

1924年, 侯外庐在同乡学友高君宇的介绍下结识中共先驱人物李大钊。此后直至1927年李大钊就义, 三年中侯外庐曾数次与李见面并讨教。李大钊多次与侯外庐说起“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 又常常谈到《资本论》, “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3](11-12)}。在李大钊潜移默化的指引下, 侯外庐踏上了赴法求学翻译《资本论》的征途。侯外庐在法国期间并未译完全书, 但这段经历意外地为他研究中国史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他说: “这件工作却帮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5](86)}

从侯外庐的回忆来看, 其《资本论》翻译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至1930年旅居巴黎期间, 根据“恩格斯审定的德文第四版, 同时参照英、法、日几种译本”, 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至二十章的翻译, 但并未出版。第二阶段是1932年开始在北京与王思华合作翻译《资本论》第一卷, 仍然“根据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进行翻译”, 侯外庐承担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至九章、第十三至十六章的重译, 以及第二十二至二十五章的新译。第一卷合译的完整本于1936年6月以“世界名著译社版”的名义出版。王思华在第一卷合译本问世后便退出了剩余部分的翻译工作。第三阶段是1934年侯外庐在山西独立翻译《资本论》第二卷的绝大部分内容, 以及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第十一章。1938年, 侯外庐在重庆得知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资本论》即将出版, 加之抗战的形势紧张, 才正式终止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这一部分译稿亦未出版, 仅存第二卷前十五章, 剩余十分之七的内容皆毁于抗战期间转运延安的途中^{[3](15, 25-28, 46-48)[4]}。

对于此前并未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且不具备德语基础的侯外庐而言, 凭借一腔热忱展开德文版《资本论》的翻译, 经历了相当的艰难与坎坷。1927年, 侯外庐入境法国后在巴黎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 经过近一年的语言准备, 正式起步试译《资本论》。在法国试译阶段以及后来回国重译的过程中, 侯外庐通过自学补习的知识, 除德文、法文之外, 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其中最下功夫处, 是与《资本论》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和哲学。为此, 他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第、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侯外庐后来关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其中的不少分析都可以在这一时期他自学补习的经济学和哲学内容中找到线索。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在谈到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时, 引入了“剩余价值率”概念, 指出均田制中“农民分地与国家土地的区划是十分严密的, 其分配形式是实物地租形态混合了劳役地租, 多数的法律把剥削规定在对分制以上, 即以剩余价值率而论多是百分之百以上”^[6], 借助“剩余价值率”的百分比数, 更为直观和定量地揭示出均田制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再比如《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分析孔子、墨子、名家思想时, 都不同程度地借引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等哲学著作中的概念和定理^[7]。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尝试, 也验证了侯外庐自己所说的: “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 不仅在于其理论, 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3](72)}

1932年, 回国两年有余的侯外庐开始与王思华合译《资本论》, 进入翻译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存在的不少疑问, 都在此次合译中得到了解决。其中最为他津津乐道的便是确定了《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解释货币的价值尺度时, 第83条脚注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将这名官员音译为Wan-Mao-in。侯外庐与王思华在请教财政史学者崔敬白后, 确定Wan-Mao-in即为《清史稿》中有列传可查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由于清史中重名现象时有发生, 侯外庐不放心根据音同确定的翻译

结果,“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 Wan-Mao-in 即王茂荫无疑”^{[3](26)}。侯外庐与王思华的译本,最早攻克了这一翻译难题^{[8](16)}。侯外庐的这段回忆是以《资本论》的翻译为中心阐述的。若从中国史研究的视角看待,通过《王侍郎奏议》研究“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的做法事实上已经深入社会经济层面的中国史研究了。这也从侧面说明,如果从后摄的视角看侯外庐《资本论》的翻译经历,其意义并不局限于翻译本身,而是侯外庐会通中西经济和社会学说的一个枢纽。

1933年,由于“许侯马事件”入狱的侯外庐,在出狱后不久回到太原。在山西期间,侯外庐开始新译《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进入翻译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侯外庐的治学取向开始不再囿于以《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学内容。他曾说:“牢狱生活,折磨得我身体很坏,医生劝我中止翻译工作,换换脑筋,于是我开始写古史研究的文章。……《社会史导论》,就是我在1933年出狱后写成的。1934年,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从此,开始了史学研究的行程。”^{[5](86-87)}侯外庐从事实陈述的角度,将自身史学研究的开端归因于《资本论》翻译的暂时中止。联系而后《社会史导论》《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从《资本论》的翻译到史学研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侯外庐高足张岂之的观察颇有见地,在他看来,侯外庐“一方面翻译《资本论》,一方面已在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9],并主张侯外庐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唯物论内容“直接来源于他1928年至1938年期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0]。也即侯外庐开展史学研究的实质,是将《资本论》翻译过程中所积累的历史唯物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具体应用至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动态过程之中。侯外庐本人也认为,“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3](72)}。纵观侯外庐翻译研读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伴随这一过程的推进,其中的知识迁移与学术联系愈发为侯外庐转向中国史研究,奠定了内容和方法上的基础。

二、《资本论》研究对象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

侯外庐开始从《资本论》的翻译转向中国史学研究之际,学界恰逢中国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为侯外庐步入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机。“生产方式”的讨论,因为关系到对社会性质的理解,是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问题。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便直白地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1](8)}。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在各自的语境中都具有提纲挈领的理论意义。这一概念在侯外庐这里则成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

1933年,回到太原的侯外庐趁着《资本论》翻译中止的空档,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社会史论导言》,根据“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体会,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问题”^{[3](177)}。侯外庐极为重视此文,将之视作自己“最早研究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5](89)}。这篇文章几经波折,修改后发表于1939年的《中苏文化》上。从修改稿内容来看,“生产方式”(原文作“生产方法”)是全文讨论的核心,在指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时,侯外庐批评了论战中秉持生产技术决定社会性质这一观点的学者,就连同属马克思主义阵营且参与过社会史论战的郭沫若也未能幸免。侯外庐说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者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未至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因是缺乏蒸汽机之论断,亦是纯粹的机械的理论”,“表示着理论素养的浅薄”^[12]。侯外庐在生产方式问

题上的“理论素养”自信,就源于已经从事了多年的《资本论》翻译^③。而他所力图达成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更准确地理解,便为《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相关的“历史学”的“统一应用”。

在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和中国社会史相关度更高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是马克思用以描述中国、印度等东方社会生产方式时所使用的。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3]。《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与第十三章“机器大工业”中也提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都未给出明确与严谨的解释^[11]。侯外庐虽未直接参与社会史论战,然基于《资本论》的翻译经验,对这一议题同样有着较郭沫若更为深入的见解。

1941年,侯外庐用半年光景集中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撰写。据他在序言中的自述,此书的写作动机是十年前翻译《资本论》期间形成的。事隔十余年后,侯外庐从中苏学界对观的视角中,回望了写作此书的背景:就苏联学界而言,“由郭先生的著作引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候,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正在苏联学者作为学术空白史提出的热烈讨论,亚细亚独立构成的空白的氏族公社社会论,封建变种论,奴隶变种论,各家论点颇为歧异”;就中国学界而言,“看了当时群起攻击郭氏的文章,没有搔到痒处”^{[14](309,311)}。这一表述虽然透露了侯外庐基于《资本论》内容而在亚细亚问题探讨上的自信,但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关于“亚细亚”和“古典”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还未形成成熟的看法。

1943年,侯外庐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处得知,苏联在前两年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可以佐证侯外庐的社会史观点。在新见资料的辅助下,侯外庐很快便完成了《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对20世纪初中、日、苏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四种代表性言论一一予以回应,提出“‘亚细亚的’是在‘古典的’前后随意排列着的”,“它和‘古典的古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的结论^[15]。至此,侯外庐才最终形成较郭沫若更为成熟的观点,也对中外尤其是苏联学界的“空白说”进行了独立的回应。《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写作在资料上曾经求助于郭沫若,但就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而言,有着十余年《资本论》翻译经验的侯外庐,已经在郭沫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了^④。

与此同时,侯外庐也真正理解了《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为何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古典的生产方式并提。在基于《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修订再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侯外庐提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明显地在一个题目下面放在同等的序列”,“这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16(5)]。从《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古典”与“古代”一字之差,背后折射的是侯外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就古希腊古罗马而言的古典时代,对中国来说则是亚细亚时代。中国古代的“亚细亚”社会,与西方古希腊“古典”时代存在着区别,具有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李学勤在回忆侯外庐时说:“三四十年代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学者,只有侯先生既对《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和理解,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17]从生产方式入手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历史,侯外庐得出了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结论。比如在探究其所认为的“中国思想史源头之一”的先王问题时,侯外庐便区分亚细亚和古典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从中国古代亚细亚的社会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思想史的起源。他认为,周代对商代的先王思想改革使得上帝和先王在周代既分离又统一,“既然是亚细亚的,所以这又产生了中国古代先王思想的特殊历史,是在典型的希腊思想史里没有的东西。这个秘密也正由于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理想,在希腊思想史里也没有的”^[16(171)],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生产方式的差别出发,揭示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在思想起源

上的差异。这个例子也说明,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出发,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方法,又可以进一步和中国思想的研究产生联系。

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侯外庐将研究重心转移至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侯外庐的社会史研究,作为《资本论》翻译与思想史研究的中间环节,连接着两者的议题探索,在侯外庐的研究生涯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三、《中国思想通史》对《资本论》理论视角的借鉴

1946年,借助生活书店决定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的契机,侯外庐提出与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合作撰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3](213)}。以这一撰写计划的敲定为界,《中国思想通史》的内容来源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第一、五卷,这一部分的主体基于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与《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在《中国思想通史》写作计划尚未出炉之前便已形成,后又修改补充。第二部分则为剩下的第二、三、四卷,由侯外庐及其研究团队根据写作计划共同完成。以上两个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资本论》的理论视角,其中尤以侯外庐执笔的两卷著作为最。

在融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叙述的重点为中国古代思想,书名中“古代”二字特指文明确立和国家成立后的奴隶制社会,源自侯外庐从《资本论》出发所形成的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理解。相较于《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以老子的经济思想为研究老子思想体系切入口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资本论》理论视角的借鉴更具代表性。侯外庐自称“对于老子的经济思想、国家学说、社会思想,以及自然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基本上在这本小册子里已经提出来了”^{[3](216)}。而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在于书中创造性地将老子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对《老子》内涵作了全新的解读。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侯外庐便用《资本论》的内容比附,推测老子生活时代南方的社会性质,认为当时“南方的经济阶段初入于文化时代,氏族社会的痕迹尚可能有某部分的遗存”。他描绘道:“如同《资本论》序文中论究德国的经济状况一样,我们可以套上另换一种阶段说,当时南方的社会,不但苦于封建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它的发展的不足。”^{[18](7)}这便为此书的第二章“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作了铺垫。在第二章中,侯外庐将《老子》第十一章作为全书的理解突破口,该章经文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9]侯外庐认为此章历史上“任何学者皆未得其正解”,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注意到特定社会属性中价值形态是否凸显。借助引用《资本论》的内容,他解释:“价值形态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是纯然社会的属性。生产物在自然的形态之下,无价值可言,只是表现为一种使用物,唯在披上社会的外衣之时,即转变而为社会的形态时,于是才在交换的形态下表现出价值对象性来。”^{[18](11)}对应到经文解释,所谓“当其无”,指的便是“生产物在自然的形态之下,无价值可言”的状态,在交换关系尚未出现的时代,老子所提及的车、器、室只是具有使用属性,“只是为共同使用而生产,而不是如同在交换关系中物件超自然的属性”。但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类社会进展到“一个历史的特定的发展时代,那样的劳动生产物才转形为商品”,这些器物在“交换的形态下表现出价值对象性来”,从而进入“有之以为利”的新阶段^{[18](12-13)}。侯外庐极为重视借鉴《资本论》以理解《老子》“有”“无”概念的经历。在重庆期间,他还孜孜不倦地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讲起这段经历,并强调“自己是翻译了《资本论》以后,才豁然开朗读懂这段

文字的”^{[3](115)}。此书后续关于老子政治、法律、道德的章节, 其分析展开皆与此章所论述的经济内容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与《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相关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初撰于1943年, 1955年侯外庐将此书的第一、二编补充修订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的书稿。侯外庐在书中继续贯彻从经济层面出发认识中国社会形态进而概括思想潮流的研究方式。此书首章为“17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 共分三节: 17世纪的中国社会、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启蒙思潮的特点, 胪列了侯外庐“启蒙思潮”观点的来龙去脉。在第一节正文中, 侯外庐提出“17世纪的中国社会, 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0](3)}。在接下来的行文中, 他从经济层面出发, 依次围绕土地所有关系、手工业与商业、商品资本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而以经济情况变动为基础, 侯外庐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也起了变化”, 随之将话题引入第二节“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在此节中, 侯外庐先借用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对16世纪初德国社会的分析。恩格斯认为“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 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 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 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21]。侯外庐明白, 中国17世纪的斗争不可能和德国16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 故而他更多的是从社会状况类比的视角, 借助恩格斯划分德国社会的“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的平民集团”的方法, 找出明末中国社会与此相对应的三个社会阶级加以分析^{[20](21)}。基于前两节的经济与社会内容, 侯外庐在第三节正式将焦点转移至明末清初启蒙思潮本身, 指出16世纪末以至17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观点, 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对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20](24, 28)}, 提示由启蒙思想向前回溯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必要性。侯外庐的这一处理, 也呈现出其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借鉴《资本论》理论视角后, 形成的从经济到社会再落脚于思想的模式。

继《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五卷之后的第二、三、四卷虽出于众人之手, 但在侯外庐的统筹下, 书中依然不乏借鉴《资本论》理论视角之处。如第三卷在言及向秀《庄子注》“善恶美丑, 各有其分, 人类的性分既然在受生之时已定, 则不能因受生之全偏而主张变易”的观点时, 侯外庐看出这种假定背后“道德活动完全适合于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局限”^[22], 从而揭示思想与经济社会因素的联动关系。第四卷描绘唐代二王八司马被贬事件时, 点出这一事件背后牵涉的二王、刘、柳的政治革新“并未超出封建制度的君臣之义”, “革新代表了当时生产力提高的要求, 所以是进步的”^[23], 将历史人物所经历的政治事件, 以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加以理解。

侯外庐晚年回望自身研究经验时, 将之概括为一条总原则: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5](89)}细绎这一观点, 其实质正是从生产方式出发, 经由社会形态判定, 最终揭示中国自身思想发展面貌的研究模式。而对这一模式进行追根溯源, 不难发现是来自《资本论》的强大影响。1980年代以来的学人, 在评述侯外庐研究成就时, 也纷纷指出侯外庐思想史研究与《资本论》研读的内在关联^⑥。可以说,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得以形成成熟系统的研究取径, 《资本论》既是时间起点, 也是逻辑起点。

四、余论

侯外庐颇为珍视翻译《资本论》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影响: “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

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3](72-73)}侯外庐推崇考据而不陷入考据的背后与20世纪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某些现象相关。他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就批评当时“缺乏基本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的学人,难以跳出“梁任公、胡适之的整理国故圈套”^{[14](309)}。侯外庐本人虽然没有和胡适有直接的学术争论,但与侯处于同一阵营的郭沫若曾质问胡适论先秦哲学时所言“政治混乱、社会黑暗”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24]。相较之下,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基于《资本论》翻译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掌握的正是胡适等学者所欠缺的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学者对侯外庐基于《资本论》翻译研读形成的思想史研究取径不以为然。如在明清与近代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侯外庐曾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与“民主”问题加以解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对此指摘道:“这个事实绝对不能原封不动地无条件地套用到中国。由于在这一点上相对化的不彻底,侯外庐的近代或民主,不过是以欧洲的近代和民主为模式。”^[25]汪晖也曾不点名地批评融入社会史后的思想史研究所招致的短板:“当我们把许多历史现象放置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之内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是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以及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识、信念和世界观的机会”^[26]。即便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盛赞侯外庐贡献的葛兆光,也指出《中国思想通史》“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27]。如果回到侯外庐的研究路径中,上述各有理据的论说成立与否则尚待商榷。侯外庐既未“原封不动地无条件地套用”马恩原典,也未因过于注重社会史因素而罔顾思想所处时代的内在视野。当将葛兆光所言“有些混乱的思想史思路”重新置于侯外庐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层层递进的框架中时,所谓的误解与混淆便得以厘清。而对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侯外庐也曾通过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解决,主张“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非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的规律”,“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5](91)}。

联系西方思想史来看,侯外庐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思想联动的研究模式,同样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西方思想史学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1940—)是两种重要研究范式的代表学者。施特劳斯注重经典文本研读,认为“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恰如以往的思想家理解自身那样去理解他们”,“根据他们本人的解释来复活其思想”^[28]。在偏重文本内容的施特劳斯看来,这些思想传统能够为现代性问题提供参考。斯金纳则主张“传统的方法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29],从而提倡思想史语境说,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和语境之中,强调思想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两位学者的研究主旨在文本释读和思想理解的角度上各有所长,或从内深究文本承载的意涵,或向外探求文本对应的语境。在这一视野中思考侯外庐肇端于《资本论》翻译研读而形成的思想史研究模式,可以发现侯外庐开创的研究范式兼顾了文本视角的内与外,形成的是一条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紧密贴合20世纪中国与民族境遇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的展开方式,实质上激活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30],无论是理论的引用还是结论的探求,都超越了单一的文本层面,服务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的中国思想史学科探索,更具有从文本到行动的跨越意义。

总的来说,从《资本论》翻译研读出发,侯外庐的一众研究成果,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全新阐述,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思想史学科层面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注释:

- ① 刘泽华在回忆学习中国思想史时, 曾流露出对《中国思想通史》的倾慕: “杨荣国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合作者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于是我提出去中山大学, 师从杨荣国进修中国思想史。”刘丰认为刘泽华“自觉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 并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参见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 第 87 页; 刘丰《刘泽华与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文史哲》2023 年第 6 期, 第 74-87 页。
- ② 张越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 “亲自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翻译工作的, 大概只有郭沫若和侯外庐两位”。参见张越《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析》, 《历史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第 60-75 页。
- ③ 任虎曾指出侯外庐的生产方式理论探索, 除了翻译《资本论》过程的体会, 也和 1933—1939 年间不断吸收苏联学界成果相关。参见任虎《被塑造的形象: 侯外庐中国社会史研究新论》,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9 期, 第 166-176 页。
- ④ 程鹏宇认为侯外庐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时, 不仅将郭沫若视为学习的对象, 更将之视为超越的对象。参见程鹏宇《导师与论敌: 论侯外庐眼中郭沫若的双重形象》, 《历史教学问题》, 2020 年第 3 期, 第 46-53 页。
- ⑤ 侯外庐原书“辐”误作“幅”。查《老子》竹简本(甲、乙、丙)、帛书本(甲、乙)、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皆作“辐”。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 五种对勘与评析引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66-167 页。
- ⑥ 蔡尚思认为侯外庐“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到中国思想史方面来”, “对于《资本论》长期下过苦功夫, 很有修养, 用来研究思想史”是不多见的。刘大年指出侯外庐的著作常常出现精到可喜之论, 这与他早年从事《资本论》翻译分不开。张越也指出, “侯外庐以十年译读《资本论》所积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厚素养, 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 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颇具个性”。参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60-65 页。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历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 第 35-42 页; 张越《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析》, 《历史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第 60-75 页。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72.
- [2] 葛兆光. 道统、系谱与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J]. 文史哲, 2006(3): 48-60.
- [3] 侯外庐. 韧的追求[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1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4] 侯外庐. 翻译《资本论》的回忆: 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起点[J]. 中国哲学, 1980(3): 355-359.
- [5] 侯外庐. 史林述学[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28 卷[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6] 侯外庐. 中国封建社会史论[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6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6.
- [7] 侯外庐.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8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85, 210, 223.
- [8] 胡培兆, 林圃.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9] 张岂之. 远见卓识的引路者: 略论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J]. 哲学研究, 1987(11): 34-37.
- [10] 张岂之. 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7(1): 18-21, 189.
- [11] 马克思. 资本论[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7, 438.
- [12] 侯外庐. 社会史论导言[J]. 中苏文化, 1939(2): 80-91.
- [1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2.
- [14] 侯外庐.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5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15] 侯外庐. 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J]. 中华论坛, 1945(7): 15-24.
- [16]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5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17] 李学勤. 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30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449.
- [18]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22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19]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6-27.
- [20]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上)[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 17 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 [21]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32.
- [22]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12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232.
- [23]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上二)[M]//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第14卷.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 339.
- [24]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7.
- [25] 沟口雄三. 《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M]//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7卷. 刘俊文, 许洋文, 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138.
- [26]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卷第一部: 理与物[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4.
- [27]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6.
- [28] 列奥·施特劳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 2版[M]. 李世祥,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 56.
- [29] 昆廷·斯金纳.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 丁耘. 什么是思想史. 任军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3.
- [30] 高广旭. 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1): 1-10.

Originating from *Das Kapital*: A re-exploration into Hou Wailu's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XIAO Yongming¹, WU Wanghai^{1,2}

(1.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nuscript Cultures, Hamburg University, Hamburg 20354, Germany)

Abstract: Hou Wailu,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began his scholarly career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Das Kapital*. The three stages of this translation process laid a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shift toward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focus of *Das Kapital* on modes of production enabled Hou to develop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llowing him to independently address the theory advocated in Soviet and other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His five-volum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incorporat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inspired by *Das Kapital*, showcasing a research model that starts with modes of production, moves through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formations, and ultimately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s. *Das Kapital*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enabling Hou to establish a mature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n his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Key words: *Das Kapital*; Hou Wailu;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编辑: 苏慧]